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 契合机理和共进路径研究

曹得宝 孙熙国

摘要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两大重要战略，二者都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行动逻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契合机理，具体包括：目标主题统一，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政治逻辑一致，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具体路径协作，均主张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行动主体联动，均主张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在实践中的协同共进需要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优化生态领域的分配格局，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进山海协作工程。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二者关系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关键词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共同富裕 契合机理 共进路径

[中图分类号] A81;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51X(2024)01-0110-10

2023年7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做足统筹协调的大文章，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以更高站位和更宽视野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同时，当前我国社会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历史阶段，推动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抓手。

开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推动共同富裕同为我国新时代新征程中的重要战略与实践构想，目前我国学界对这两个问题均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但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或者说讨论二者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大部分学者是从理论层面出发思考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的关系问题。如有的学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理应纳入共同富裕的框架，而且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驱动性力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进展需要确立可持续性的发展目标、分工协作的治理架构和绿色共富的制度体系（沈满洪，2021）。有的学者指出了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助于为推动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构筑精神家园，厚植生态价值（方世南、韩叶，2023）。也有学者从实践案例入手思考这一问题，如有的学者考察了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实现共同富裕仍面临着生态文化遗产与生态安全等现实挑战，以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媒介、路径、机制及其经验研究”（批准号：2022JZDZ01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共同富裕视域下社会生态正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批准号：2023M730069）；东湖高新区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综合基地项目“数字赋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2023年—2024年）。

【作者简介】 曹得宝（1992-），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博雅博士后，北京大学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邮政编码：100871；孙熙国（1965-），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① 习近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求是》2023年第22期，第5页。

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可以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路径（陈庆玲、伍艳，2023）。有的学者探讨了黄河流域推进“生态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包括生态环境质量、生态资源储备、生态治理能力和生态经济水平四个维度（刘培等，2023）。从以上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学界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研究仍有待深入和提升。剖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问题应思考二者在理论上的契合机理，探究二者在实践上的共进路径。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理论经纬和行动逻辑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都有着丰富的理论意涵，且深化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分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理论经纬与行动逻辑是思考二者关系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我国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命题。从理论经纬层面上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概念话语上的原创性和规范性。虽然国外提出和流行过可持续发展等理论和政策话语，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才是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生态环境议题深入思考的原创性论断。其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层面论证了人和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②。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批判了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大生产对利润的无限追逐使得人们盲目地掠夺自然资源，“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③，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呈现出和谐的状态，才能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④。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凸显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强调（杨宁，2021）。我们在探究和思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时往往容易忽视“社会主义”这一前缀，而这一前缀凸显的正是我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时所应坚持的鲜明的社会主义政治取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占有和合理使用生产资料。广大劳动人民既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也是其劳动产品的主人，扭转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异化的状态。这也就要求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时必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即“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⑤。同时，社会主义生产坚持的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⑥的原则，这就可以实现对资本和技术的有效规制，避免了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盲目性和非可持续性的弊端，从而确保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共进。

从行动逻辑层面来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从来都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假设，而是要转化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具体行动。一方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主张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党和政府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摆在推进民族复兴的重要位置，我国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决心和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的。尽管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但空气污染、黑臭水体、垃圾围城等现象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和净土保卫战，深入解决我国现存的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那些影响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身心健康的突出性生态环境难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5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7页。

⑤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第1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3页。

生态文明要通过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来构建一种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社会。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绝不否定经济社会发展意义上的现代化，也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要积极破解经济社会持续增长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化和低碳化，加快整体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这就需要健全绿色低碳的生产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推进工业绿色化升级，提高服务业的绿色化水平。同时还应构建绿色低碳的消费体系，有效遏制奢侈性浪费，激发全社会的绿色消费潜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党和政府也高度重视推进共同富裕目标战略的问题。从理论层面来看，一方面，新时代共同富裕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的无情压榨，进而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农民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①。即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为改变贫富差距的现象和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制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②，这也就是说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作为物质基础。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做大社会财富的“蛋糕”，为实现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提供现实前提。同时，还应不断完善我国的分配制度，不断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分好社会财富的“蛋糕”，从而彰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③。推动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奋斗目标，广大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执政的深厚基础和底气所在，只有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才能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从实践层面来看，我国党和政府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推动共同富裕绝不仅仅是理论阐释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实践中推动其实现。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注定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任务，但我国当前阶段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这也就导致了我国不同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不尽相同，需要选取一些地区先行先试。2021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共同富裕意见》），选取浙江省作为推进共同富裕实践建设的试点省份，支持浙江通过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该意见从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等方面对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出了具体要求。^④这是我国党和政府在实践中把推动共同富裕摆在更重要位置的关键决策，为浙江省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提供了重要遵循。共同富裕的实践推动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多主体的复杂性系统工程，涉及顶层制度的布局和基层实践的反馈。我们应充分重视共同富裕的宏观政策设计与地方实践探索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契合机理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虽然是不同维度的国家战略，但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二者之间在目标主题、政治逻辑、具体路径和行动主体四个方面存在着密切的契合机理。

（一）目标主题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探索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构成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③ 《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人民日报》2021年1月12日，第1版。

④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25页。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远景战略目标，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人、自然、社会三者关系协调发展的价值追求，二者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共同富裕出发来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来说，实现共同富裕就意味着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衡的协调共享机制、和谐的社会文化等。我国以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破除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这一现代化模式虽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剧，造成了贫困率的升高、中产阶层的塌陷等社会撕裂现象的出现。一些后发国家作为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追随者，同样面临着社会动荡和贫富差距拉大等残酷现实。我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则以人民为中心，追求的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只服务少数资本所有者利益的行径，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重塑了我们对于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选择。而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则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思想，重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深刻揭示了为什么要保护生态环境的问题，阐明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谋求共建绿色地球家园，在全球范围内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文明意蕴，绘制了人类美好生活的崭新图景。

此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将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中央发布的《共同富裕意见》中专门指出浙江省要通过高水平建设美丽浙江，全面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来打造美丽宜居的生活环境。有学者也指出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分为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个要素，而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就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要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郁建兴、任杰，2021），这也就意味着可持续性的共同富裕指向的就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原则的社会愿景。同时，开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必将促进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可以将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资源禀赋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红利，切实增进民众的福祉。同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孕育出的诸如塞罕坝精神、右玉精神等鲜明案例，也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艰苦创业来谋求发展的信心与决心。这不仅拓展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开辟了新的路径。

（二）政治逻辑一致：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无论是开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还是推动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都是其政策和实践取得成功的核心所在，这是二者相一致的政治逻辑。

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出发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导性力量。一方面，我们要确保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地位，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在规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有效地解决生态环境难题。生态环境问题不单单是一个环境治理层面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①。长期以来，我们党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够确保在面对资本扩张与环境保护的两难选择时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并最终选择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践行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与使命。另一方面，我们应积极发挥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作用。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加强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政治责任的重要保证。

从推动共同富裕出发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②。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离不开中国

①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第9页。

②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第4页。

共产党的领导。早在建党初期，李大钊同志就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①。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推进共同富裕铺平了道路。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共同富裕这一重大课题做出了新的探索。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共同富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党和政府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认识，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取得了更为显著的实质性进展。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就是党领导人民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百年奋斗史。

（三）具体路径协作：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重要文件奠定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要求我们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重点领域和相关环节的改革上取得显著的成果，形成完备科学且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只有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行稳致远。

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角度看，对我国而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推动国家治理水平提升的基础性要素，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我们不断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这其中，关键的是应推动我国生态文明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是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法治保障，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领域的立法水平得到不断提升，但我国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仍有待完善。一是应以环境污染防治为切入点，构建环境污染防治的区域联动法律制度，重点关注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二是应完善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积极实行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进一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切实增强将制度和法律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能力，彻底改变传统的高消耗和高污染的生产与消费模式。

从推动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心所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的必然要求。在共同富裕的视域下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一是要将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发挥基层党组织对基层治理和共同富裕的引领作用；二是要着力夯实基层群众自治的社会基础，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民生服务相关的管理权限下放到基层，特别是农村基层。以便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更快捷地解决民众的日常诉求，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层面基本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三是要积极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民主自治建设，增强基层活力，加强基层法治建设，提升法治水平，推动基层道德治理，弘扬社会正气，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法治保障和舆论环境。

（四）行动主体联动：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

对于开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共同富裕来讲，人民群众都是极为重要的主体性力量。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的行动主体联动就要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参与。

从开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来看，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形成人人支持和参与生态文明事业的良好风尚是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的社会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与此同时，民众也很容易陷入物质化消费主义和生活方式的陷阱，而这种消费与生活方式的蔓延最终会导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培育和提高人民群

^①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最新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4页。

众的生态文明意识，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就显得非常有现实必要性。一方面，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的开展还主要集中在学校层面，但提升民众的生态文明意识是一项全民工程，仅靠学校教育是远远不够的，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另一方面，我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广阔实践表明了政府、社会和民众之间可以形成一种建设性互动关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可以不断推动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文明意识和扩大民众对生态文明事业的参与。同时，广大民众通过对绿色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广泛参与和对政府生态管护实践的有效监督，构成了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发展前进的主体性动力源泉。

在推动共同富裕层面，积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全面激发劳动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依靠。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互帮互助和合力推进。因此党和政府要科学统筹、引导规划，尊重人民群众在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带领人民群众共建美好生活，共创美好社会，加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效。同时，还应不断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振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①。具体来说需要强化城镇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博物馆、文化馆等设施的建设与改造，提升服务水平。除此之外，还应重点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建好用好农家书屋、农村文化礼堂等基础设施。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共进路径——基于浙江实践的思考

中央发布的《共同富裕意见》为浙江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奠定了行动基础和发展指南。浙江省在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建设方面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浙江省经济社会整体富裕程度较高，发展均衡性较好，改革创新意识较为强烈。同时，浙江省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和率先实践地，持之以恒推进生态省建设，走出了一条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协同共进的实践道路。具体来说，浙江省在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优化生态领域的分配格局，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进山海协作工程四个方面推进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实践落地。这些举措发扬了浙江省作为全国唯一的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引领作用，壮大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加强了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激发了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健全了共同富裕的帮扶机制。从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协同共进的角度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的创新实践体系。

（一）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壮大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②。在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协同共进时，我们容易面对有损生态环境的非可持续性发展方式和相关产业转变阻力较大的问题。其中面临的困难首先是资金方面的问题，低耗能、低污染的生产方式对于设备水平和生产环境要求比较高，这就会使相关企业面临比较大的资金压力；其次，产业的无序升级也容易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二次破坏。在国家政策推动和市场倒逼的前提下，诸多企业开始主动谋划产业转型升级，但由于缺乏相关经验与技术，容易出现废弃设备回收不当和电子废弃物处理不当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最后，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监管力度尚显不足。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开展工作时难以覆盖到数量众多的企业，临时性的突击检查也只能起到警示作用，尚不足以推动企业主动转变环保理念。经

①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第4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0页。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度发达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离开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无源之水”。只有通过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才能在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壮大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需要大力推进绿色产业。绿色产业是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的，其目标是充分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摒弃以往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方式，代之以符合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发展模式。追求经济社会发展和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必然对立的，我们要通过实现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携手并进。浙江省杭州市自2004年以来就启动了“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对高能耗、低效益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等措施，腾出更多空间来发展太阳能光伏、新能源汽车、电子商务等绿色低碳产业。同时，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还应大力推进绿色科技创新。推进绿色科技创新的关键是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绿色科技人才队伍，因此要大力加强绿色科技专业教育，培育高级绿色科技人才。还应建好用好绿色科技研发平台和基地，为广大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还要积极发挥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驱动的创新机制，加强政府、科技界、企业界的通力合作。如杭州市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电子商务等高精尖数字产业的发展，打造了具有全国乃至全世界影响力的万亿级数字产业集群，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打造了新型业态。

（二）优化生态领域的分配格局，加强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协同共进行面临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共同富裕的阻力较大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态环境领域分配格局亟待优化。第一是生态要素纳入分配体系不足的问题。随着极端气候问题频发和自然资源短缺加剧等问题的出现，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突出生态要素在财富分配体系中的作用对于促进生态资源富集地区的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是有些地区对生态要素的挖掘尚显不足的问题。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的开展都需要建立在对生态要素的充分挖掘的基础之上，但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和对生态要素利用的观念落后等原因，对生态要素的挖掘尚有欠缺。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①。分配格局的改革与完善是关系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问题，而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协同共进，就要持续完善生态环境领域的分配格局，不断加强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在初次分配中，应积极推进将生态要素纳入财富分配体系。生态要素包括土地、森林、水、海洋、冰川等自然资源，也包括排污容量、气候容量、碳汇等（沈满洪，2021）。将生态要素纳入财富分配体系就是要通过生态要素价值评估、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市场化等手段，推进生态要素的成本与收益纳入经济增长核算；在再分配中，应不断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强向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来改善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解决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如浙江省财政厅于2017年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建立省内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不断创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截至2021年底，浙江省实施了52对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共兑现激励资金2.7亿元；在第三次分配中，应积极发动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捐赠和资助等形式参与环保公益慈善活动，在全社会营造热心公益和助力环保的风尚。优化生态环境领域的分配格局有助于通过三种分配方式的优势互补和协调联动来推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激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同时也指出了我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②。推进

①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第7页。

②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0页。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协同共进应关注我国缓解相对贫困任务艰巨的问题。首先是缓解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构建不足。经济基础薄弱、扶贫措施不可持续等都是造成我国有些地区出现相对贫困问题的原因，我们应思考如何利用这些地区的生态资源禀赋，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相关机制来激活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努力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其次是人才队伍建设不充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想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人才队伍都是关键。有的地区面临着人才引进难，引进后人才扎根难等问题，我们应思考如何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相关专业人才的扎根与发展。

2019年，浙江省丽水市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创新开拓了多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首先需要建立完备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综合考虑生态产品的类型、生态产品的开发成本、市场供给等因素，制定科学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是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前提。丽水市依托中国科学院编制了《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总值核算指标体系》，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态产品类型和特征设计了生态物质产品、生态调节服务、生态文化服务三个一级指标和若干个二级、三级、四级指标，实现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核算的标准化。同时，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还需要完善生态产品市场机制。众所周知，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形式，发挥市场作用可以吸纳社会资本，发展生态产业，优化生态产品流通渠道，从而推动城乡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丽水市通过培育生态产业，整合当地特色农产品资源，引进品牌建设人才队伍，搭建人才发展平台，打造了“丽水山耕”和“丽水山泉”等生态产业品牌。成功拓宽了生态资源产品化和产业化变现渠道，构建了科学完备的人才引进与培育体系，打造了共同富裕的绿色“金名片”，实现了广大群众的勤劳致富。

（四）推进山海协作工程，健全共同富裕的帮扶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①。在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共同富裕的协同共进时，我们应坚持久久为功的原则。首先，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共同富裕容易产生运动式治理的弊端。运动式治理指的是各级政府所主导的，针对施政过程中遇到的重大且复杂问题而开展的一项具有突击性质的治理行动。运动式治理能够在短时间内汇集大量的组织资源，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永葆绿水青山需要久久为功，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也不是“同时富裕”，而是“以先富带动后富”；其次，我国目前“以先富带动后富”的措施力度尚有待提高。目前我国“以先富带动后富”的举措多是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传统手段，但一方面，当下我国的税收政策在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方面作用有限。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保障工作的目标是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在缩小贫富差距问题上也是作用有限。我们应积极通过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相关举措创新“以先富带动后富”的工作方法，加强“以先富带动后富”的力度。山海协作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作出的重大战略性部署，是“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是浙江省在生态环境领域推进共同富裕的帮扶机制的重要创新举措。

2003年，浙江省出台了《关于全面实施“山海协作工程”的若干意见》，确定了“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工作原则。进入新时代以来，浙江省不断创新协作模式，推动山海协作工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共同富裕协同共进的重要战略。一方面，山海协作工程使得山区县市的基础设施短板得到较快提升，为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构建了重要保障。如衢宁铁路等重要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与陆续建成，结束了龙泉市和遂昌县等地区不通铁路的历史；另一方面，山海协作工程激活了山区县市的发展动力。山海协作工程在山区县市建设了山海协作产业园、山海协作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山海协作飞地园区等不同类型的产业园区，实现了沿海发达地区和山区县市地区的优势互补与合作共赢，进一步促进了山区县市地区生态产业

^①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第6页。

的发展和生态产品的孵化，从而帮助山区县市地区群众实现了增收致富，在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上迈出新的步伐。

四、总结与反思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共同富裕存在着密切的契合机理并且可以在实践中实现相互促进。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张力。

一方面，推动共同富裕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增长，使我们在开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时必然面临着自然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容量有限，甚至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解决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肯定就意味着我们应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增长，也就是将“蛋糕”做大。但纵观全球，从生态环境的视域来看，现代化的社会和经济增长离不开两个必要条件：自然资源的源源不断的供给和生态环境容量的无限度扩张，而我们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储量以及现有生态环境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承载量都有着一定的限度。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地球复原力中心（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er）的相关科研团队提出了“地球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的概念，“地球边界”学说认为人类已经突破了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在内的六个方面的“地球边界”或者说“红线”，直接威胁到地球的繁荣与稳定。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推动共同富裕时，必须注重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否则就有可能面临自然资源供给不畅甚至破坏生态环境以掠夺自然资源的被动局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认识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若想通向共同富裕这一美好愿景也需要通过生态文明经济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嫁接”。我们开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并不只是塑造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态美景，而是要通过生态文明经济在实践中培育绿色化的产品产业、技术工艺和消费模式，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生态文明经济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伞形概念下关乎经济领域的术语，其强调的是通过经济的生态化和生态的经济化的实践样态来推动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下的绿色经济创新。上述关于浙江开展的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优化生态领域分配格局等举措其实都是推动生态文明经济发展的创新性实践探索。同时，根据我国推进新时代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安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经济基础性作用的阐发和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基本规定，只有创造并不断完善生态文明经济，与之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治理才能得以协同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才不至于沦为“空中楼阁”，共同富裕的实践征程才能得以动态发展和持续推进。

参考文献

陈庆玲、伍艳（2023）：《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现实挑战及系统治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8期，第20—28页。

方世南、韩叶（2023）：《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研究》，《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1—10页。

刘培、李小建、茹雪等（2023）：《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演化逻辑与实践探索》，《区域经济评论》第5期，第95—107页。

沈满洪（2021）：《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共同富裕观》，《治理研究》第5期，第5—13页。

郁建兴、任杰（2021）：《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政治学研究》第3期，第13—25页。

杨宁（2021）：《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认知、愿景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2期，第122—132页。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Research on the Coherence Mechanism and Common Progress Path

CAO De-bao, SUN Xi-guo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are two important strategies in my country's new journey of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Both have rich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action logic. There is a close match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cluding: unity of goals and themes, both of which are the proper meaning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nsistent political logic, and both uphold and improve the party's leadership; specific Path collaboration advocates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ction subject linkage advocates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progress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requires accelerat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ethods, optimizing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the ecological field, innovating the path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promoting mountain-sea collaboration project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lso realize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tension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fitting mechanism; common progress path

责任编辑: 朱守先